

# 此情绵绵无绝期 (下)

□钱正英



黄辛白



钱正英

## 签名赠书 结婚纪念

1950年春,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作,重回上海。不久,黄也从安徽省委调到上海,任华东团工委统战部长,这大概也是组织上对我们的照顾吧。但是,谁也没想到,当年夏季,淮河发生严重水灾。1950年冬,中央决定在蚌埠成立淮河水利委员会,统筹豫、皖、苏三省的治淮工作,调我兼任淮委的工程部副部长,要求立即赴蚌。这样,他刚从安徽调到上海,我却从上海调往安徽了。1951年秋,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安度汛期后,经组织批准,我们在上海结婚。从1943年确定恋爱关系到1951年结婚,整整经历了八年。后来,他还经常向儿女们谈起这段历史,小女儿笑着说:“八年了,抗战都胜利了,你们也该结婚了!”

在那个年代,我们的婚礼仪式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从蚌埠坐火车在9月7日早晨到达上海,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招待所安顿下来。黄把我带去他在华东团工委的宿舍,也就是我们的“新房”。那是一间朝南明亮的房间,床上一条蓝色绸面的棉被,是他的母亲亲手缝制送来的。我们商量上街去购买一些结婚用品。在街上想来想去,也没什么需要买的,最后,买了两把牙刷和两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保尔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偶像,我们签名互赠,作为结婚纪念。晚上由我的大姐在她家,请我们俩和我们的老朋友李叔明夫妇一起吃饭,然后就去华东团工委,参加为我们组织的一个小型茶话会,分发了糖果,仪式就告结束。但是,我们两人在自己的房里,还是认真回顾了我们的感情成长的历史,并互表了坚贞不二的忠诚。

## 教育世家 回归教育

结婚后没几天,我就赶回蚌埠。我们的共同生活,是在来往频繁的信件上体现的。

不久,他从华东团工委调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教授。从此,我们两人都确定了在建设新中国中各自的终生职业。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,水利属于土木的范围;黄在大学的职业是电机工程,并不是教育。当年在淮北解放区的许多上海大学生,都曾分配到学校教书,其中不少还是教育专业的,但解放后终生做教育工作的,好像只有他一个人。现在想起来,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。他的家乡在上海嘉定,他们家族有办教育的传统,他的伯祖父黄文惠于1901年创办“中英普通学社”,后改为“普通小学”,其立意就是要为普通老百姓办学。他的父亲黄允之(抗战前去世)于1917年与

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

黄炎培先生共同创办“中华职业教育社”,1919年亲任普通小学校长,由他与黄炎培联合创办的中华珐琅厂提供经济资助。当时普通小学提出的一些教育理念,还是很符合现代精神的。看来,黄辛白毕生从事教育,是有其渊源的。

## “生一个孩子检讨一次,不能再生了”

1953年,我们先后调到北京,才真正组成了家庭。我们有三个孩子,看着孩子们逐渐成长,是我们最大的



幸福。当时他的母亲经常来北京主持家务,又有一位与我们亲如家人的老保姆。我们俩没有多少家务负担,也很年轻,工作之余,冬天学溜冰,夏天学游泳,或者带孩子们去北海划船。溜冰后吃串冰糖葫芦,划船时捎带在湖岸的石头缝里捉螺蛳,回家吃炒螺蛳,有滋有味,真是其乐融融!至今,有的老同事还提起,时常遇到我们俩背着溜冰鞋在街上走,这在当时的同级干部中,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事,所以有很深印象。那几年,可算是我们一生最轻松的时光了。

“文革”以前,他的工作比较顺利,从交大调到高教部,任工业司副司长,以后任司长,1965年任高教部副部长。我在工作中却不断遭遇挫折。1952年生第一个孩子时,淮河中游遭遇涝灾,我受到责难,作了检讨;1954年生第二个孩子时,淮河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,我负责修建的润河集水闸被冲毁,中游的淮河大堤决口,我向国务院自请处分;1960年生第三个孩子后,黄河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严重淤积,冀鲁豫平原又发生严重涝灾,我疲于奔命。我自嘲地说,生一个孩子检讨一次,不能再生了。1958年中央确定“三主”的治水方针(“蓄水为主,

小型为主,群众自办为主”),简称“蓄、小、群”,被称为“无产阶级路线”),我在党内有的领导眼中,成了与“蓄、小、群”对立的“排(水)、大(型)、国(国家举办)资产阶级路线”的代表人物,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内外交困。但回到家里,还是能得到黄的理解和宽慰,体会到家的温暖。

## 动乱年代 尊严依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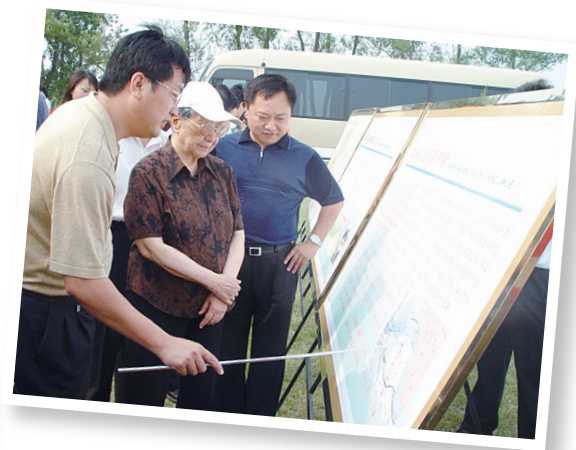
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后,黄受到的冲击远比我大。中共北京市委被打倒后,国务院各部中,高教部首当其冲。当我们这些部的领导,还在勉强支撑工作时,高教部以蒋南翔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,早已被“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千只脚”了。一天早晨,黄从床上坐起来,忧心忡忡地对我说,这次运动,来势这么猛,最后结局如何,很难预料。我知道他的意思,立刻表态:“不管外边的大字报怎么样,我们互相都很清楚,我们是革命的。”以后,运动越来越升级,但不管他在外边受到什么样的侮辱,在家里总是尊严依旧。当运动发展到两派斗争时,我们两个都已作为“走资派”被打倒,白天“靠边站”,在机关劳动,晚上回家倒有一段难得的逍遥时光。当时,学校都已停课,孩子们已无学可上了。大女儿在

周荣鑫同志任教育部部长,他受教育部委托,带领一个“大学校长代表团”去欧美国考察。这是“文革”期间,中国高等教育界极为罕见的一次高级别的出访。可是,当他们怀着极大抱负回国时,国内已开始“批邓”。第二天在北大等待他的,是铺天盖地的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大字报。就这样,他再一次受到批判。

## 改革开放 心情舒畅

改革开放后,我们真正过上了一段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又心情舒畅的好日子。在重回教育部岗位后,他为教育的现代化又做了不少事。但是,我们都渐渐地老了。尤其是他,受了十多年的煎熬,身体大不如前。

1988—1998年,我们同时进入第七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。1998年后,他完全退出公职。我到2003年后才完全退下,但仍在中国工程院承担一些咨询研究项目。我们两个都不上班了,但我每天还在书房里忙碌。



嘉定档案局提供图片

他有时向亲友们半抱怨半表扬地说:“每天都坐在计算机前,也不知忙些什么。”尽管有点抱怨,但他仍尽力支持我继续工作。他不止一次自豪地说:“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,必定有一个女人;其实,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,也同样需要一个男人。”

去解放区时,组织上要我们俩扮表兄妹。结果,长期以来,我们在生活上一直是这样的关系。初入解放区的时候,我们五个人中,我比他们四人都小两岁,加上家里娇生惯养,生活能力远不如他们,行军中经常丢三落四,他一直留意照顾我。记得在1944年夏,我们一起参加区党委办的整风学习班后,我被留在淮北行署工作,直到冬季才抽空回学校搬取衣物。他已早早地请当地大嫂为我缝制了一件新棉袄,使我十分惊喜。现在两人的年龄都这么大了,他还老是对我不放心。每逢出差,他都要叮嘱我的随行人员:“到了地点不要忘了打电话回来,报个平安。”他到外地出差时,只要有时间上街,首先想到的,是给我买些小礼品。我的衣料、手表、眼镜架,等等,都是他精心选购的。我们最后一次春节在杭州度假,他还带着女儿为我选购了一件棉袄。在家里,我的生活用品都由

他包揽,眼镜坏了,手表没电了,闹钟坏了,圆珠笔的笔芯用完了……都交给给他。

## 相依相靠 白首偕老

不上班以后,我们家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:早晨起来,一起吃早饭,两人合作做牛奶麦片,我调制麦片粥,他负责热牛奶,配合密切。早餐后我为我们两人各泡一杯上好的绿茶,我在书房里工作,他在客厅看报,然后独自出去散步。中午只有我们两人在家,由炊事员准备最简单的上海口味的午餐:周一菜饭,周二馄饨,周三雪里红肉丝面……午休后,我继续在书房工作,他看电视。到四点左右,他为我们两人各冲一杯香浓的咖啡,一般还外加饼干等小点心。我到客厅,坐在一张长桌前,和他一边吃一边闲聊(现在他的照片就挂在我的座位后面)。午茶后如果电视有好节目,他就邀我同看。有时他发现报章杂志有精彩文章,也介绍给我。有时我们买个光盘在家看,去年此时,我们刚看完《集结号》,开始看《士兵突击》。晚餐是我们全家聚餐,照顾孩子们的北方口味,好在我们俩南北都可适应。晚饭以后,我们两人雷打不动的是看《新闻联播》,然后看中央一台黄金时段的电视剧。我们的爱好相同,最爱看的是革命历史剧,一边看一边引发感慨和议论。看完《晚间新闻》后,他回卧室休息,我看当天的报纸。

我们也经常接待一些老朋友和亲

戚,在家里聚餐。每次他都是中心人物,尤其在一些年轻人中间,人们都喜欢听他说古道今,听他那坦荡幽默的谈话。他喜欢吃肥肉,别人因他血压高,劝他少吃一些,他半真半假地回答:“共产党员死都不怕,还怕肥肉?”每年长假,我们去故乡或名胜景点,游览一番。他喜爱照相,每次回来,都精心制作一本相册。他和我们的大女儿还负责全家的花卉树木,一年四季,室里院内,都保持郁郁葱葱。我和小外孙,只在其中研究蜗牛、喜鹊、蚂蚁、苍蝇等的生活规律。

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恬淡而有韵味,原以为我们就会这样渐渐老去,正像一首歌唱的:“和你一起慢慢变老,直到我们……”

谁知……

在泪水中写下了这篇回忆。我现在只希望尽完自己的责任后,和他同归大自然。

我给子女们留下的遗言是:将来把我们两人的骨灰,合在一起,撒入大海。我们将合二为一,载着我们的情谊,共同遨游,化为万物,生生不息。借用白居易的诗,只改一个字: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情绵绵无绝期。